

60 年前“割蛋”和“毛人水怪”言风波



上世纪 50 年代初期，华北和华东地区分别爆发过“割蛋”与“毛人水怪”两大谣言，其波及范围之广，在中国历史上罕见。其传播跨越了北京、河北、山西、内蒙古、江苏、安徽和山东数省、直辖市和自治区，涉及约 100 个县，数千万人口。从 1950 年第一个谣言的大规模爆发到 1954 年第二个谣言基本结束，延续数年。期间逾百人因此丧命，上千人被捕。

“割蛋”可造原子弹

“苏联要造原子弹，原料是男人的睾丸，女人的乳房和子宫、小孩的肠子。政府答应供给苏联，于是派便衣部队到全国各地割这些东西送给苏联。割蛋的人化装成和尚、道士、商人、农夫，他们都经过专门训练，能飞檐走壁，白天侦查，晚上动手。”

这是“割蛋”谣言的主要内容。

谣言传播之处，民众高度恐慌。男人晚上上房站岗，妇女并房睡觉，不敢下地干活，行人不敢单独走路。个别人因情绪紧张而幻视幻听，往往在夜里听见狗吠而惊慌失措，望见影子大惊失色，以致发生误会。一处喊叫，全村响应，一村呼喊，邻村震动。张家口地区在 1950 年 7 月 27 日至 8 月 8 日这 13 天内，群众无故乱喊相互惊扰即达 166 起。同期在北京市郊区，因为民众恐慌，仅一个 400 户村民的村庄，就因谣言购买手电筒 1000 个，门户紧闭，彻夜亮灯，每晚消耗点灯煤油 25 斤。

“毛人水怪”刀枪不入

“毛人水怪”则谣传：“美、英、法等国进攻苏联，苏要

制造原子弹以对付 5 国进攻，要中国提供女人奶头、男

孩生殖器作为原子弹原料”。共产党放出“毛人水怪”，挖人心、人眼，奶头、鸡蛋(睾丸)、扒孕妇的胎儿，送给苏联造原子弹。“水鬼”、“毛人”白天是挂证书的干部，晚上就现原形。谣言说“毛人水怪”一蹦能上房，一跃能过河。也有的谣言称：“毛人”毛手毛脚，手脚一伸就是火，刀枪不入。“毛人水怪”被认为怕光，谣传“‘水鬼毛人’不怕枪，不怕炮，就怕点灯来睡觉”，因此许多地方夜晚不敢熄灯。

谣言在传播过程中，引起了各地不同程度的社会动荡。山东省郯城县，谣言蔓延全县，致使群众彻夜不眠，田不荒芜，无人安心劳动。在江苏省，谣言波及苏北 35 个县、市，历时 6 个月才基本平息，各种工作几乎陷入停顿。仅据 15 个县、市的统计，各种误伤事件就造成群众伤 814 人，死 35 人。有的地区民众白天不敢下田干活，夜间集中住宿，学生不敢上学，每天要在太阳出得老高，才有

人外出行走。安徽省谣言流行地区，村民普遍集体睡觉，青壮年男子均组织起来，持枪弄棒，枕戈待旦。所有窗户一律堵死，以防“水鬼毛人”钻入，到处是灯光长明。一有响动，即认为是“水鬼毛人”来临，大声呼救。有的用广播筒向邻村传播“毛人情报”，以提醒邻村加强防范，从而轰动全乡、全区乃至全县。个别乡甚至出现小村并大村。有的地方民兵，在混乱中盲目放枪壮胆，造成伤亡。还有人因过度惶恐而自杀。也有因男女集体睡觉，妇女被辱，导致羞愤自杀的。

有人估计 1950 年谣言爆发地区（北京与天津除外），文盲人口占成年人的比重应在 90%左右，甚至于更高一些。在一个文盲集中的地区，广大缺乏科学知识的民众对核武器产生了神秘和恐怖的心理，特别是“弹”、“蛋”谐音，容易与制造原子弹产生联想，然后互相传播，这就可能诞生谣言。

（摘自《先锋国家历史》李若建/文）

班昭是东汉著名的才女，她与班固、班超是一奶同胞。虽说，这位旷世奇女在史学和文学方面很有造诣，但是，她亲自捉刀的《女诫》(又称《七诫》)，则变成了中国历代妇女的行为规范和精神枷锁。这个温柔、典雅的女子，无意之中充当了一名剿悍的“劫匪”，她替男人们绑架了自己无辜又无知的女同胞。

《女诫》分为“卑弱”、“夫妇”、“敬慎”、“妇行”、“专心”、“曲从”、“叔妹”7 篇，共约 1700 字。班昭开门见山就讲“卑弱”，班昭引用《诗经·小雅》中的说法：“生男曰弄璋，生女曰弄瓦。”以为女性生来就不能与男性相提并论，必须“晚寝早作，勿憊夙夜；执务和事，不辞剧易。”才能克尽本分。

班昭大量引用《礼》的格言恐吓说：“夫有再娶之义，妇无二适之文，故曰夫者天也。天固不可

（摘自《北京日报》7.23）

唐代对待“公罪”和“私罪”，分别不同情况量刑，其基本原则是私罪者从重，公罪者减轻。官吏犯公罪，即使主观上无犯罪故意，主观心理属于不觉或不知情，大多数情况下也仍要被处罚，只不过在量刑上有所减轻。

总之，“唐律”“公罪”和“私罪”的区分，是合理的。从行为人主观状态角度来区分，公罪多出于过失，私罪多出于故意。从惩处原则角度来区分，对公罪的处罚要轻于私罪。如此规定，既有益于整治监督官吏的职务活动，也可以充分发挥官吏职能管理的积极性，同时鼓励官吏执行公务中坚持原则，不怕得罪上级和皇帝，坚持个人操守，务求清白，决不贪赃枉法。

（摘自《意林》第 14 期 王力/文）

唐代官员的『公罪』和『私罪』

唐律中明确把官吏的犯罪行为划分成“公罪”和“私罪”两大类。“公罪”是因承办公事不力、失误或者差错，而不是出于个人的私心或出于私利的目的。这就意味着“公罪”的确定，主要是考察官吏主观上是否有“私心”或有“私利目的”，而不是看其行为后果是否违法。

私罪则正好相反，做的事与公事无关，只是为了谋私利，或者打着办公事的旗号办私事，在这过程中所犯的罪叫做私罪。

公罪与官吏职务相关，至于私罪则应该区别对待。因为《唐律》中的私罪并非都是纯粹的“私的行为”，私罪可以有两种情况，其一，与公事根本无关而违法犯罪，如个人盗、奸等行为；其二，利用职权贪赃枉法或诈取私利。前者是封建官吏的“私的行为”，与官吏的公务职责根本无关，完全是个人行为，这部分私罪应划到职守范围之外。后者之所以称为私罪，是因为其行为动机出于私利，但是却与公事有关，或者直接利用执行公务职责之便，或者间接借助拥有的权势。

唐律对待“公罪”和“私罪”，分别不同情况量刑，其基本原则是私罪者从重，公罪者减轻。官吏犯公罪，即使主观上无犯罪故意，主观心理属于不觉或不知情，大多数情况下也仍要被处罚，只不过在量刑上有所减轻。

唐律中明确把官吏的犯罪行为划分成“公罪”和“私罪”两大类。“公罪”是因承办公事不力、失误或者差错，而不是出于个人的私心或出于私利的目的。这就意味着“公罪”的确定，主要是考察官吏主观上是否有“私心”或有“私利目的”，而不是看其行为后果是否违法。

私罪则正好相反，做的事与公事无关，只是为了谋私利，或者打着办公事的旗号办私事，在这过程中所犯的罪叫做私罪。

公罪与官吏职务相关，至于私罪则应该区别对待。因为《唐律》中的私罪并非都是纯粹的“私的行为”，私罪可以有两种情况，其一，与公事根本无关而违法犯罪，如个人盗、奸等行为；其二，利用职权贪赃枉法或诈取私利。前者是封建官吏的“私的行为”，与官吏的公务职责根本无关，完全是个人行为，这部分私罪应划到职守范围之外。后者之所以称为私罪，是因为其行为动机出于私利，但是却与公事有关，或者直接利用执行公务职责之便，或者间接借助拥有的权势。

唐律对待“公罪”和“私罪”，分别不同情况量刑，其基本原则是私罪者从重，公罪者减轻。官吏犯公罪，即使主观上无犯罪故意，主观心理属于不觉或不知情，大多数情况下也仍要被处罚，只不过在量刑上有所减轻。

（摘自《北京日报》7.23）

唐代官员的『公罪』和『私罪』

唐律中明确把官吏的犯罪行为划分成“公罪”和“私罪”两大类。“公罪”是因承办公事不力、失误或者差错，而不是出于个人的私心或出于私利的目的。这就意味着“公罪”的确定，主要是考察官吏主观上是否有“私心”或有“私利目的”，而不是看其行为后果是否违法。

私罪则正好相反，做的事与公事无关，只是为了谋私利，或者打着办公事的旗号办私事，在这过程中所犯的罪叫做私罪。

公罪与官吏职务相关，至于私罪则应该区别对待。因为《唐律》中的私罪并非都是纯粹的“私的行为”，私罪可以有两种情况，其一，与公事根本无关而违法犯罪，如个人盗、奸等行为；其二，利用职权贪赃枉法或诈取私利。前者是封建官吏的“私的行为”，与官吏的公务职责根本无关，完全是个人行为，这部分私罪应划到职守范围之外。后者之所以称为私罪，是因为其行为动机出于私利，但是却与公事有关，或者直接利用执行公务职责之便，或者间接借助拥有的权势。

唐律对待“公罪”和“私罪”，分别不同情况量刑，其基本原则是私罪者从重，公罪者减轻。官吏犯公罪，即使主观上无犯罪故意，主观心理属于不觉或不知情，大多数情况下也仍要被处罚，只不过在量刑上有所减轻。

唐律中明确把官吏的犯罪行为划分成“公罪”和“私罪”两大类。“公罪”是因承办公事不力、失误或者差错，而不是出于个人的私心或出于私利的目的。这就意味着“公罪”的确定，主要是考察官吏主观上是否有“私心”或有“私利目的”，而不是看其行为后果是否违法。

私罪则正好相反，做的事与公事无关，只是为了谋私利，或者打着办公事的旗号办私事，在这过程中所犯的罪叫做私罪。

公罪与官吏职务相关，至于私罪则应该区别对待。因为《唐律》中的私罪并非都是纯粹的“私的行为”，私罪可以有两种情况，其一，与公事根本无关而违法犯罪，如个人盗、奸等行为；其二，利用职权贪赃枉法或诈取私利。前者是封建官吏的“私的行为”，与官吏的公务职责根本无关，完全是个人行为，这部分私罪应划到职守范围之外。后者之所以称为私罪，是因为其行为动机出于私利，但是却与公事有关，或者直接利用执行公务职责之便，或者间接借助拥有的权势。

唐律对待“公罪”和“私罪”，分别不同情况量刑，其基本原则是私罪者从重，公罪者减轻。官吏犯公罪，即使主观上无犯罪故意，主观心理属于不觉或不知情，大多数情况下也仍要被处罚，只不过在量刑上有所减轻。

（摘自《北京日报》7.23）

唐代官员的『公罪』和『私罪』

唐律中明确把官吏的犯罪行为划分成“公罪”和“私罪”两大类。“公罪”是因承办公事不力、失误或者差错，而不是出于个人的私心或出于私利的目的。这就意味着“公罪”的确定，主要是考察官吏主观上是否有“私心”或有“私利目的”，而不是看其行为后果是否违法。

私罪则正好相反，做的事与公事无关，只是为了谋私利，或者打着办公事的旗号办私事，在这过程中所犯的罪叫做私罪。

公罪与官吏职务相关，至于私罪则应该区别对待。因为《唐律》中的私罪并非都是纯粹的“私的行为”，私罪可以有两种情况，其一，与公事根本无关而违法犯罪，如个人盗、奸等行为；其二，利用职权贪赃枉法或诈取私利。前者是封建官吏的“私的行为”，与官吏的公务职责根本无关，完全是个人行为，这部分私罪应划到职守范围之外。后者之所以称为私罪，是因为其行为动机出于私利，但是却与公事有关，或者直接利用执行公务职责之便，或者间接借助拥有的权势。

唐律对待“公罪”和“私罪”，分别不同情况量刑，其基本原则是私罪者从重，公罪者减轻。官吏犯公罪，即使主观上无犯罪故意，主观心理属于不觉或不知情，大多数情况下也仍要被处罚，只不过在量刑上有所减轻。

（摘自《北京日报》7.23）

唐代官员的『公罪』和『私罪』

唐律中明确把官吏的犯罪行为划分成“公罪”和“私罪”两大类。“公罪”是因承办公事不力、失误或者差错，而不是出于个人的私心或出于私利的目的。这就意味着“公罪”的确定，主要是考察官吏主观上是否有“私心”或有“私利目的”，而不是看其行为后果是否违法。

私罪则正好相反，做的事与公事无关，只是为了谋私利，或者打着办公事的旗号办私事，在这过程中所犯的罪叫做私罪。

公罪与官吏职务相关，至于私罪则应该区别对待。因为《唐律》中的私罪并非都是纯粹的“私的行为”，私罪可以有两种情况，其一，与公事根本无关而违法犯罪，如个人盗、奸等行为；其二，利用职权贪赃枉法或诈取私利。前者是封建官吏的“私的行为”，与官吏的公务职责根本无关，完全是个人行为，这部分私罪应划到职守范围之外。后者之所以称为私罪，是因为其行为动机出于私利，但是却与公事有关，或者直接利用执行公务职责之便，或者间接借助拥有的权势。

唐律对待“公罪”和“私罪”，分别不同情况量刑，其基本原则是私罪者从重，公罪者减轻。官吏犯公罪，即使主观上无犯罪故意，主观心理属于不觉或不知情，大多数情况下也仍要被处罚，只不过在量刑上有所减轻。

唐律中明确把官吏的犯罪行为划分成“公罪”和“私罪”两大类。“公罪”是因承办公事不力、失误或者差错，而不是出于个人的私心或出于私利的目的。这就意味着“公罪”的确定，主要是考察官吏主观上是否有“私心”或有“私利目的”，而不是看其行为后果是否违法。

私罪则正好相反，做的事与公事无关，只是为了谋私利，或者打着办公事的旗号办私事，在这过程中所犯的罪叫做私罪。

公罪与官吏职务相关，至于私罪则应该区别对待。因为《唐律》中的私罪并非都是纯粹的“私的行为”，私罪可以有两种情况，其一，与公事根本无关而违法犯罪，如个人盗、奸等行为；其二，利用职权贪赃枉法或诈取私利。前者是封建官吏的“私的行为”，与官吏的公务职责根本无关，完全是个人行为，这部分私罪应划到职守范围之外。后者之所以称为私罪，是因为其行为动机出于私利，但是却与公事有关，或者直接利用执行公务职责之便，或者间接借助拥有的权势。

唐律对待“公罪”和“私罪”，分别不同情况量刑，其基本原则是私罪者从重，公罪者减轻。官吏犯公罪，即使主观上无犯罪故意，主观心理属于不觉或不知情，大多数情况下也仍要被处罚，只不过在量刑上有所减轻。

（摘自《北京日报》7.23）

唐代官员的『公罪』和『私罪』

唐律中明确把官吏的犯罪行为划分成“公罪”和“私罪”两大类。“公罪”是因承办公事不力、失误或者差错，而不是出于个人的私心或出于私利的目的。这就意味着“公罪”的确定，主要是考察官吏主观上是否有“私心”或有“私利目的”，而不是看其行为后果是否违法。

私罪则正好相反，做的事与公事无关，只是为了谋私利，或者打着办公事的旗号办私事，在这过程中所犯的罪叫做私罪。

公罪与官吏职务相关，至于私罪则应该区别对待。因为《唐律》中的私罪并非都是纯粹的“私的行为”，私罪可以有两种情况，其一，与公事根本无关而违法犯罪，如个人盗、奸等行为；其二，利用职权贪赃枉法或诈取私利。前者是封建官吏的“私的行为”，与官吏的公务职责根本无关，完全是个人行为，这部分私罪应划到职守范围之外。后者之所以称为私罪，是因为其行为动机出于私利，但是却与公事有关，或者直接利用执行公务职责之便，或者间接借助拥有的权势。

唐律对待“公罪”和“私罪”，分别不同情况量刑，其基本原则是私罪者从重，公罪者减轻。官吏犯公罪，即使主观上无犯罪故意，主观心理属于不觉或不知情，大多数情况下也仍要被处罚，只不过在量刑上有所减轻。

唐律中明确把官吏的犯罪行为划分成“公罪”和“私罪”两大类。“公罪”是因承办公事不力、失误或者差错，而不是出于个人的私心或出于私利的目的。这就意味着“公罪”的确定，主要是考察官吏主观上是否有“私心”或有“私利目的”，而不是看其行为后果是否违法。

私罪则正好相反，做的事与公事无关，只是为了谋私利，或者打着办公事的旗号办私事，在这过程中所犯的罪叫做私罪。

公罪与官吏职务相关，至于私罪则应该区别对待。因为《唐律》中的私罪并非都是纯粹的“私的行为”，私罪可以有两种情况，其一，与公事根本无关而违法犯罪，如个人盗、奸等行为；其二，利用职权贪赃枉法或诈取私利。前者是封建官吏的“私的行为”，与官吏的公务职责根本无关，完全是个人行为，这部分私罪应划到职守范围之外。后者之所以称为私罪，是因为其行为动机出于私利，但是却与公事有关，或者直接利用执行公务职责之便，或者间接借助拥有的权势。

唐律对待“公罪”和“私罪”，分别不同情况量刑，其基本原则是私罪者从重，公罪者减轻。官吏犯公罪，即使主观上无犯罪故意，主观心理属于不觉或不知情，大多数情况下也仍要被处罚，只不过在量刑上有所减轻。

（摘自《北京日报》7.23）

唐代官员的『公罪』和『私罪』

唐律中明确把官吏的犯罪行为划分成“公罪”和“私罪”两大类。“公罪”是因承办公事不力、失误或者差错，而不是出于个人的私心或出于私利的目的。这就意味着“公罪”的确定，主要是考察官吏主观上是否有“私心”或有“私利目的”，而不是看其行为后果是否违法。

私罪则正好相反，做的事与公事无关，只是为了谋私利，或者打着办公事的旗号办私事，在这过程中所犯的罪叫做私罪。

公罪与官吏职务相关，至于私罪则应该区别对待。因为《唐律》中的私罪并非都是纯粹的“私的行为”，私罪可以有两种情况，其一，与公事根本无关而违法犯罪，如个人盗、奸等行为；其二，利用职权贪赃枉法或诈取私利。前者是封建官吏的“私的行为”，与官吏的公务职责根本无关，完全是个人行为，这部分私罪应划到职守范围之外。后者之所以称为私罪，是因为其行为动机出于私利，但是却与公事有关，或者直接利用执行公务职责之便，或者间接借助拥有的权势。

唐律对待“公罪”和“私罪”，分别不同情况量刑，其基本原则是私罪者从重，公罪者减轻。官吏犯公罪，即使主观上无犯罪故意，主观心理属于不觉或不知情，大多数情况下也仍要被处罚，只不过在量刑上有所减轻。

唐律中明确把官吏的犯罪行为划分成“公罪”和“私罪”两大类。“公罪”是因承办公事不力、失误或者差错，而不是出于个人的私心或出于私利的目的。这就意味着“公罪”的确定，主要是考察官吏主观上是否有“私心”或有“私利目的”，而不是看其行为后果是否违法。

私罪则正好相反，做的事与公事无关，只是为了谋私利，或者打着办公事的旗号办私事，在这过程中所犯的罪叫做私罪。

公罪与官吏职务相关，至于私罪则应该区别对待。因为《唐律》中的私罪并非都是纯粹的“私的行为”，私罪可以有两种情况，其一，与公事根本无关而违法犯罪，如个人盗、奸等行为；其二，利用职权贪赃枉法或诈取私利。前者是封建官吏的“私的行为”，与官吏的公务职责根本无关，完全是个人行为，这部分私罪应划到职守范围之外。后者之所以称为私罪，是因为其行为动机出于私利，但是却与公事有关，或者直接利用执行公务职责之便，或者间接借助拥有的权势。

唐律对待“公罪”和“私罪”，分别不同情况量刑，其基本原则是私罪者从重，公罪者减轻。官吏犯公罪，即使主观上无犯罪故意，主观心理属于不觉或不知情，大多数情况下也仍要被处罚，只不过在量刑上有所减轻。

唐律中明确把官吏的犯罪行为划分成“公罪”和“私罪”两大类。“公罪”是因承办公事不力、失误或者差错，而不是出于个人的私心或出于私利的目的。这就意味着“公罪”的确定，主要是考察官吏主观上是否有“私心”或有“私利目的”，而不是看其行为后果是否违法。

私罪则正好相反，做的事与公事无关，只是为了谋私利，或者打着办公事的旗号办私事，在这过程中所犯的罪叫做私罪。

公罪与官吏职务相关，至于私罪则应该区别对待。因为《唐律》中的私罪并非都是纯粹的“私的行为”，私罪可以有两种情况，其一，与公事根本无关而违法犯罪，如个人盗、奸等行为；其二，利用职权贪赃枉法或诈取私利。前者是封建官吏的“私的行为”，与官吏的公务职责根本无关，完全是个人行为，这部分私罪应划到职守范围之外。后者之所以称为私罪，是因为其行为动机出于私利，但是却与公事有关，或者直接利用执行公务职责之便，或者间接借助拥有的权势。

唐律对待“公罪”和“私罪”，分别不同情况量刑，其基本原则是私罪者从重，公罪者减轻。官吏犯公罪，即使主观上无犯罪故意，主观心理属于不觉或不知情，大多数情况下也仍要被处罚，只不过在量刑上有所减轻。

唐律中明确把官吏的犯罪行为划分成“公罪”和“私罪”两大类。“公罪”是因承办公事不力、失误或者差错，而不是出于个人的私心或出于私利的目的。这就意味着“公罪”的确定，主要是考察官吏主观上是否有“私心”或有“私利目的”，而不是看其行为后果是否违法。

私罪则正好相反，做的事与公事无关，只是为了谋私利，或者打着办公事的旗号办私事，在这过程中所犯的罪叫做私罪。

公罪与官吏职务相关，至于私罪则应该区别对待。因为《唐律》中的私罪并非都是纯粹的“私的行为”，私罪可以有两种情况，其一，与公事根本无关而违法犯罪，如个人盗、奸等行为；其二，利用职权贪赃枉法或诈取私利。前者是封建官吏的“私的行为”，与官吏的公务职责根本无关，完全是个人行为，这部分私罪应划到职守范围之外。后者之所以称为私罪，是因为其行为动机出于私利，但是却与公事有关，或者直接利用执行公务职责之便，或者间接借助拥有的权势。

唐律对待“公罪”和“私罪”，分别不同情况量刑，其基本原则是私罪者从重，公罪者减轻。官吏犯公罪，即使主观上无犯罪故意，主观心理属于不觉或不知情，大多数情况下也仍要被处罚，只不过在量刑上有所减轻。

唐律中明确把官吏的犯罪行为划分成“公罪”和“私罪”两大类。“公罪”是因承办公事不力、失误或者差错，而不是出于个人的私心或出于私利的目的。这就意味着“公罪”的确定，主要是考察官吏主观上是否有“私心”或有“私利目的”，而不是看其行为后果是否违法。

私罪则正好相反，做的事与公事无关，只是为了谋私利，或者打着办公事的旗号办私事，在这过程中所犯的罪叫做私罪。

公罪与官吏职务相关，至于私罪则应该区别对待。因为《唐律》中的私罪并非都是纯粹的“私的行为”，私罪可以有两种情况，其一，与公事根本无关而违法犯罪，如个人盗、奸等行为；其二，利用职权贪赃枉法或诈取私利。前者是封建官吏的“私的行为”，与官吏的公务职责根本无关，完全是个人行为，这部分私罪应划到职守范围之外。后者之所以称为私罪，是因为其行为动机出于私利，但是却与公事有关，或者直接利用执行公务职责之便，或者间接借助拥有的权势。

唐律对待“公罪”和“私罪”，分别不同情况量刑，其基本原则是私罪者从重，公罪者减轻。官吏犯公罪，即使主观上无犯罪故意，主观心理属于不觉或不知情，大多数情况下也仍要被处罚，只不过在量刑上有所减轻。

唐律中明确把官吏的犯罪行为划分成“公罪”和“私罪”两大类。“公罪”是因承办公事不力、失误或者差错，而不是出于个人的私心或出于私利的目的。这就意味着“公罪”的确定，主要是考察官吏主观上是否有“私心”或有“私利目的”，而不是看其行为后果是否违法。

私罪则正好相反，做的事与公事无关，只是为了谋私利，或者打着办公事的旗号办私事，在这过程中所犯的罪叫做私罪。

公罪与官吏职务相关，至于私罪则应该区别对待。因为《唐律》中的私罪并非都是纯粹的“私的行为”，私罪可以有两种情况，其一，与公事根本无关而违法犯罪，如个人盗、奸等行为；其二，利用职权贪赃枉法或诈取私利。前者是封建官吏的“私的行为”，与官吏的公务职责根本无关，完全是个人行为，这部分私罪应划到职守范围之外。后者之所以称为私罪，是因为其行为动机出于私利，但是却与公事有关，或者直接利用执行公务职责之便，或者间接借助拥有的权势。

唐律对待“公罪”和“私罪”，分别不同情况量刑，其基本原则是私罪者从重，公罪者减轻。官吏犯公罪，即使主观上无犯罪故意，主观心理属于不觉或不知情，大多数情况下也仍要被处罚，只不过在量刑上有所减轻。

唐律中明确把官吏的犯罪行为划分成“公罪”和“私罪”两大类。“公罪”是因承办公事不力、失误或者差错，而不是出于个人的私心或出于私利的目的。这就意味着“公罪”的确定，主要是考察官吏主观上是否有“私心”或有“私利目的”，而不是看其行为后果是否违法。

私罪则正好相反，做的事与公事无关，只是为了谋私利，或者打着办公事的旗号办私事，在这过程中所犯的罪叫做私罪。

公罪与官吏职务相关，至于私罪则应该区别对待。因为《唐律》中的私罪并非都是纯粹的“私的行为”，私罪可以有两种情况，其一，与公事根本无关而违法犯罪，如个人盗、奸等行为；其二，利用职权贪赃枉法或诈取私利。前者是封建官吏的“私的行为”，与官吏的公务职责根本无关，完全是个人行为，这部分私罪应划到职守范围之外。后者之所以称为私罪，是因为其行为动机出于私利，但是却与公事有关，或者直接利用执行公务职责之便，或者间接借助拥有的权势。

唐律对待“公罪”和“私罪”，分别不同情况量刑，其基本原则是私罪者从重，公罪者减轻。官吏犯公罪，即使主观上无犯罪故意，主观心理属于不觉或不知情，大多数情况下也仍要被处罚，只不过在量刑上有所减轻。

唐律中明确把官吏的犯罪行为划分成“公罪”和“私罪”两大类。“公罪”是因承办公事不力、失误或者差错，而不是出于个人的私心或出于私利的目的。这就意味着“公罪”的确定，主要是考察官吏主观上是否有“私心”或有“私利目的”，而不是看其行为后果是否违法。

私罪则正好相反，做的事与公事无关，只是为了谋私利，或者打着办公事的旗号办私事，在这过程中所犯的罪叫做私罪。

公罪与官吏职务相关，至于私罪则应该区别对待。因为《唐律》中的私罪并非都是纯粹的“私的行为”，私罪可以有两种情况，其一，与公事根本无关而违法犯罪，如个人盗、奸等行为；其二，利用职权贪赃枉法或诈取私利。前者是封建官吏的“私的行为”，与官吏的公务职责根本无关，完全是个人行为，这部分私罪应划到职守范围之外。后者之所以称为私罪，是因为其行为动机出于私利，但是却与公事有关，或者直接利用执行公务职责之便，或者间接借助拥有的权势。

唐律对待“公罪”和“私罪”，分别不同情况量刑，其基本原则是私罪者从重，公罪者减轻。官吏犯公罪，即使主观上无犯罪故意，主观心理属于不觉或不知情，大多数情况下也仍要被处罚，只不过在量刑上有所减轻。

唐律中明确把官吏的犯罪行为划分成“公罪”和“私罪”两大类。“公罪”是因承办公事不力、失误或者差错，而不是出于个人的私心或出于私利的目的。这就意味着“公罪”的确定，主要是考察官吏主观上是否有“私心”或有“私利目的”，而不是看其行为后果是否违法。

私罪则正好相反，做的事与公事无关，只是为了谋私利，或者打着办公事的旗号办私事，在这过程中所犯的罪叫做私罪。

公罪与官吏职务相关，至于私罪则应该区别对待。因为《唐律》中的私罪并非都是纯粹的“私的行为”，私罪可以有两种情况，其一，与公事根本无关而违法犯罪，如个人盗、奸等行为；其二，利用职权贪赃枉法或诈取私利。前者是封建官吏的“私的行为”，与官吏的公务职责根本无关，完全是个人行为，这部分私罪应划到职守范围之外。后者之所以称为私罪，是因为其行为动机出于私利，但是却与公事有关，或者直接利用执行公务职责之便，或者间接借助拥有的权势。

唐律对待“公罪”和“私罪”，分别不同情况量刑，其基本原则是私罪者从重，公罪者减轻。官吏犯公罪，即使主观上无犯罪故意，主观心理属于不觉或不知情，大多数情况下也仍要被处罚，只不过在量刑上有所减轻。

唐律中明确把官吏的犯罪行为划分成“公罪”和“私罪”两大类。“公罪”是因承办公事不力、失误或者差错，而不是出于个人的私心或出于私利的目的。这就意味着“公罪”的确定，主要是考察官吏主观上是否有“私心”或有“私利目的”，而不是看其行为后果是否违法。

私罪则正好相反，做的事与公事无关，只是为了谋私利，或者打着办公事的旗号办私事，在这过程中所犯的罪叫做私罪。

公罪与官吏职务相关，至于私罪则应该区别对待。因为《唐律》中的私罪并非都是纯粹的“私的行为”，私罪可以有两种情况，其一，与公事根本无关而违法犯罪，如个人盗、奸等行为；其二，利用职权贪赃枉法或诈取私利。前者是封建官吏的“私的行为”，与官吏的公务职责根本无关，完全是个人行为，这部分私罪应划到职守范围之外。后者之所以称为私罪，是因为其行为动机出于私利，但是却与公事有关，或者直接利用执行公务职责之便，或者间接借助拥有的权势。

唐律对待“公罪”和“私罪”，分别不同情况量刑，其基本原则是私罪者从重，公罪者减轻。官吏犯公罪，即使主观上无犯罪故意，主观心理属于不觉或不知情，大多数情况下也仍要被处罚，只不过在量刑上有所减轻。

唐律中明确把官吏的犯罪行为划分成“公罪”和“私罪”两大类。“公罪”是因承办公事不力、失误或者差错，而不是出于个人的私心或出于私利的目的。这就意味着“公罪”的确定，主要是考察官吏主观上是否有“私心”或有“私利目的”，而不是看其行为后果是否违法。

私罪则正好相反，做的事与公事无关，只是为了谋私利，或者打着办公事的旗号办私事，在这过程中所犯的罪叫做私罪。

公罪与官吏职务相关，至于私罪则应该区别对待。因为《唐律》中的私罪并非都是纯粹的“私的行为”，私罪可以有两种情况，其一，与公事根本无关而违法犯罪，如个人盗、奸等行为；其二，利用职权贪赃枉法或诈取私利。前者是封建官吏的“私的行为”，与官吏的公务职责根本无关，完全是个人行为，这部分私罪应划到职守范围之外。后者之所以称为私罪，是因为其行为动机出于私利，但是却与公事有关，或者直接利用执行公务职责之便，或者间接借助拥有的权势。

唐律对待“公罪”和“私罪”，分别不同情况量刑，其基本原则是私罪者从重，公罪者减轻。官吏犯公罪，即使主观上无犯罪故意，主观心理属于不觉或不知情，大多数情况下也仍要被处罚，只不过在量刑上有所减轻。

唐律中明确把官吏的犯罪行为划分成“公罪”和“私罪”两大类。“公罪”是因承办公事不力、失误或者差错，而不是出于个人的私心或出于私利的目的。这就意味着“公罪”的确定，主要是考察官吏主观上是否有“私心”或有“私利目的”，而不是看其行为后果是否违法。

私罪则正好相反，做的事与公事无关，只是为了谋私利，或者打着办公事的旗号办私事，在这过程中所犯的罪叫做私罪。

公罪与官吏职务相关，至于私罪则应该区别对待。因为《唐律》中的私罪并非都是纯粹的“私的行为”，私罪可以有两种情况，其一，与公事根本无关而违法犯罪，如个人盗、奸等行为；其二，利用职权贪赃枉法或诈取私利。前者是封建官吏的“私的行为”，与官吏的公务职责根本无关，完全是个人行为，这部分私罪应划到职守范围之外。后者之所以称为私罪，是因为其行为动机出于私利，但是却与公事有关，或者直接利用执行公务职责之便，或者间接借助拥有的权势。

唐律对待“公罪”和“私罪”，分别不同情况量刑，其基本原则是私罪者从重，公罪者减轻。官吏犯公罪，即使主观上无犯罪故意，主观心理属于不觉或不知情，大多数情况下也仍要被处罚，只不过在量刑上有所减轻。

唐律中明确把官吏的犯罪行为划分成“公罪”和“私罪”两大类。“公罪”是因承办公事不力、失误或者差错，而不是出于个人的私心或出于私利的目的。这就意味着“公罪”的确定，主要是考察官吏主观上是否有“私心”或有“私利目的”，而不是看其行为后果是否违法。

私罪则正好相反，做的事与公事无关，只是为了谋私利，或者打着办公事的旗号办私事，在这过程中所犯的罪叫做私罪。

公罪与官吏职务相关，至于私罪则应该区别对待。因为《唐律》中的私罪并非都是纯粹的“私的行为”，私罪可以有两种情况，其一，与公事根本无关而违法犯罪，如个人盗、奸等行为；其二，利用职权贪赃枉法或诈取私利。前者是封建官吏的“私的行为”，与官吏的公务职责根本无关，完全是个人行为，这部分私罪应划到职守范围之外。后者之所以称为私罪，是因为其行为动机出于私利，但是却与公事有关，或者直接利用执行公务职责之便，或者间接借助拥有的权势。

唐律对待“公罪”和“私罪”，分别不同情况量刑，其基本原则是私罪者从重，公罪者减轻。官吏犯公罪，即使主观上无犯罪故意，主观心理属于不觉或不知情，大多数情况下也仍要被处罚，只不过在量刑上有所减轻。

唐律中明确把官吏的犯罪行为划分成“公罪